

# 流金岁月

陈俊生题

刘凯  
李平  
董玉振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 流金岁月

董玉振  
李平 著  
刘凯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金岁月/董玉振等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 6

ISBN 7-80094-556-1

I. 流…

II. 董…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3173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市通州区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41 千字插页 2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 价: 18.50 元

## 序

《流金岁月》这本纪实文学，以朴实无华的笔触，撰写了五六十年代，小兴安岭林区人民向深山老林进军，向落后的生产方式挑战，建设美好家园，最终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林业发展道路的感人事迹。这是一部林区人民开发创业的史诗，记载着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当年王钊这位年轻的党的基层领导干部，是开发建设林区这个群体中的优秀代表。

我与王钊同志在黑龙江省共事多年，“文革”前我们一起被批准为省委常委，同在省委班子里共事，经常接触，彼此是了解的。他少年投身革命，1945年随部队到东北做地方工作，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炼与战争烽火的雕塑，形成了真诚坦白、豁达乐观、吃苦耐劳、好学深思、平等民主、开拓进取的工作作风。这些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王钊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是一位很有开拓精神的党的领导干部，可以说是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的战士，身上总有一股“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劲头。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火车上听到一个陌生的人说：“王钊这个人开拓精神可真强，哪里有困难，省委就调他到哪里去，在哪里都能打开局面。”近半个世纪，他工作的足迹遍布在黑土地上，从森林茂密的小兴安岭到

千里冰封的黑河，从北疆边陲的黑河又转到高寒的“禁区”大兴安岭林区。我读了《流金岁月》后，对他过去的工作，又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当作者希望我给本书作序时，我欣然同意了。

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抗美援朝，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国家建设如火如荼，百业待兴。1954年秋，32岁的共产党员王钊，受省委之命，任伊春林区工委书记，担负起保证国家建设所需木材，把小兴安岭建设成社会主义新林区的重任。

逶迤千里的小兴安岭，树浪直拍天涯，风光壮丽如画，是祖国木材的宝库、著名的红松故乡。然而，开发之初，这里生活条件、工作环境是极其艰苦的。当时的一切是那样的原始、落后，也包括人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旧中国没有自己的林业。解放前是日本掠夺式的采伐，建国初又学苏联“剃头式”的“皆伐”。建设社会主义新林区路在何方？新林区是什么样子？没有现成的答案。

“苦雨凄风何时住，荆棘布满人间路。”王钊面对困难重重而又完全崭新的事业，他率领林区人民发扬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开山劈岭，架桥修路，在昔日野无人迹的地方建起了栋栋厂房和住宅。家属上山定居了，实现了机械化常年采伐作业，有了学校、医院，开辟了副食和蔬菜基地，搞起了木材综合利用，开始营造新的林海。没用国家投资，修筑了一条23公里长的“共青团铁路”。这些，是林区人民的创举，是前无古人的业

绩。这一代林区人以苦为乐，以贡献为荣，为祖国建设提供了大量物资，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是一个流金般的岁月。

王钊在伊春林区工作八年零半载，顶风冒雪下基层、钻林子，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工人住的地窖子里，出现在山场采伐、集材工地上，出现在妇女垦荒队伍中，出现在抗洪抢险的前线。他时时想着群众，处处依靠群众，事事为了群众。从王钊一班人的行为中，充分地体现了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伊春党委制定的“三化四自给”的工作方针，以及营造新的林海，实现“青山长在，永续利用”的长远规划，是反映林区人民根本利益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得到了林区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读了《流金岁月》，我在想，当一个干部把个人的思想情感和事业追求，完全地融入到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中时，才能有强大的号召力，不断地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同他们一道干出一番伟大的业绩。现在，有些年轻干部不懂得这些，工作中出现了问题，只想着找上级求情、诉苦，而不愿下去找人民群众商量。不会走群众路线的干部，不会调查研究，是干不好工作的，也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

作为基层领导干部，王钊有着自己的领导风格。他不是靠手中的权力来发号施令，而是用自己的威信去带动和启发群众。他有一个信条：“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在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干部都是冲锋在前，高喊着“跟我上”；而现在，有的干部在困难面前，却先要喊一

声“给我上”。一字之差，后者，人民群众是不会拥护的，这样的干部怎么会有所作为呢？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王钊的威信是因其廉洁奉公、勤政爱民而一点一滴形成的。他从不搞特殊化，能受得住工人裹脚布的臭味，能吃得香大酱大葱拌粗饭，能在几十人通卧的板铺上进入梦乡……1961年7月，刘少奇主席到伊春林区视察，委派夫人王光美同志到王钊家里看望。王光美掀开了炕席的一角，那是东北人习惯睡的土火炕；掀开了锅盖，锅里正煮着大饺子饭……这就是一个市委书记的家，也是一个俭朴的和普通林区工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家。几十年过去了，王钊没有丢掉艰苦奋斗的本色，他家里的陈设依然简朴，洁白的墙壁上挂着方毅同志题赠的“淡泊明志”的条幅。今天，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我们不要求现在的干部再去过苦日子。但是，在许多地方还没有脱贫的情况下，我们总可以要求党的干部不能铺张浪费，更不能贪污腐败。周总理曾教诲过：“我们的下一代，总是要把自己摆在劳苦大众一起，要能够吃得起苦。因为我们的革命精神，就是从吃苦中得来的！”

1963年春，省委调王钊任黑河地委书记。在“文革”中，王钊虽遭受迫害，但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当允许他从“牛棚”中出来看病后不久，他又被调到大兴安岭地委书记，去治理那个因“十年动乱”而造成的困难局面。之后，当省府所在地哈尔滨市的“文革”后的混乱局面未稳时，党又调他到哈尔滨市

工作，直至后来调省任政协主席。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撰写了《垦荒是大事，想到千百年》的报告，李先念主席看后作了批示，《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全文发表。文中表明，当时的王钊早已想到了生态平衡与人类生存的大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哈尔滨市因“文革”中“派性”残余作怪，有些人围攻市委、制造混乱时，内定去哈尔滨工作的王钊拿起皮包就说我去看看，亲到现场调解。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对此大加表扬，说我们的干部应该像王钊同志那样，哪里有矛盾夹起皮包就去，到现场解决问题。

《流金岁月》中的王钊，是一生中最好年华的王钊，他把自己的青春时光献给了林区人民。大青山巍巍，汤旺河流长。在王钊身上所体现出的林区人民艰苦创业的精神和红松一样的品格是永存的，它必将成为鼓舞后人不断奋进的力量。

我能为描述王钊同志的著作写序，感到很荣幸！

陈俊生

一九九八年四月七日



# 目 录

序 .....	陈俊生 ( 1 )
1. 栉风沐雨住泥棚 .....	( 1 )
2. 励精图治长扎营 .....	( 19 )
3. 忧怜主人劳作苦 .....	( 37 )
4. 驯教铁牛任驰骋 .....	( 53 )
5. 求知求贤多善用 .....	( 68 )
6. 一言一行总关情 .....	( 81 )
7. 筑巢引得凤飞舞 .....	( 98 )
8. 尊师重教思远程 .....	( 113 )
9. 勤政廉政做公仆 .....	( 126 )
10. 奉公利公树党风 .....	( 144 )
11. 红心善导林海艺 .....	( 158 )
12. 赤子长怀万年青 .....	( 172 )
13. 综合利用废变宝 .....	( 188 )

14. 自力更生衣食丰 ..... (202)
15. 一往情深向沂蒙 ..... (217)
16. 血洒天堑架彩虹 ..... (230)
17. 育树育林育人才 ..... (245)
18. 千山万岭荡春风 ..... (259)
19. 几多风雨几多情 ..... (272)
20. 居安思危业无穷 ..... (288)

## 1. 栉风沐雨住泥棚

小兴安岭的冬季是寒冷的，特别是“腊八寒天儿，冻坏酱坛儿”的时候，更冷得煞实，哈出一口气就是一团白雾。

清晨，天就下起了鹅毛大雪，直到眼擦黑，才算拉开“磴儿”。浩瀚的林海一片银白。

大雪刚住，可又刮起了拧劲儿的西北风，林子里雪雾迷漫，树吼枝嚎。虽说将近是落日时分，但天色已十分暗淡。

在层层峰峦之中，蜿蜒的乌马岭山脚下，坐落着乌马河森工局安全伐木场场部，这是一座简易的木刻楞大棚。在它旁边有一栋地窨子式的伐木工人宿舍，屋里搭着长长的木杆铺，上面摆满了一个个行李卷儿。屋地中间搪着一溜木案子，旁边立着一个用废汽油桶制成的火炉，炉子里的大块木柈正在熊熊燃烧。屋里显得分外暖和。

此时，屋内只有两个人。在靠南墙的木杆铺上，坐着一位年轻干部，正饶有兴致地和伐木场主任刘文秀唠嗑儿。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伊春林区工作委员会的新任书记王钊。

王钊，三十一二岁年纪，高高的个头，健壮的体魄，微红的脸膛，浓重的双眉，明亮的眼睛，既透着质朴、坦诚、刚毅，也显示着机智、文雅、乐观。他少年投身革命，曾经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炼与战争烽火的雕塑，虽然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但由于自幼渴望知识，孜孜不倦地学习，成了工农干部中的文化

人。这年秋天，也就是1954年9月，他由省城哈尔滨调来伊春林区后，多数时间都在下基层、钻林子，为的是要在林业生产的黄金季节里，了解木材生产情况和工人生活情况。

坐在王钊对面的伐木场主任刘文秀，年近五十岁，是木把出身，人称“刘大押角子”，解放后入了党，被提拔为干部。

王钊来到这里，在听完刘文秀关于场里情况的汇报后，天就蒙蒙煞煞地黑了，无法再去山场，决定在场里住下来。

按着刘文秀的打算，想让王书记睡在场部办公室的桌子上，清静又暖和，能保证睡眠。可王钊拒绝了，他执意要睡在工舍里，为的是和工人们谈谈唠唠方便，也想体察一下睡地窖子的滋味儿。

这个地窖子建在朝阳山坡的丛林中，附近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被冰雪覆盖着。地窖子半卧于地下，屋顶苫着红松树皮，四周没有一扇窗户，即便是正晌午头，屋内也是黑乎乎的，整天全靠着煤油灯照明。

王钊借着灯光看了一下手表，此时听到屋外传来一阵说笑声，于是，他中断了和刘文秀的谈话，下地连连抄起两块干木片子填进了炉子里，炉膛内噼啪作响，火燃烧得更旺了。

“咣当！”工舍的门开了，收工的工人们拿着斧锯、搬钩、扒门等生产工具相继走进屋来。王钊忙迎上去，主动和工人们打招呼。

这时，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工人走进工舍，看上去他身体很结实，只是微微有点儿驼背，当他听过刘文秀的介绍后，有几分激动地同王钊紧紧握手。

王钊亲切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

老工人回答：

“俺叫李升。”

王钊睁大了眼睛：

“听口音，你也是山东人？”

李升点点头：

“俺是黄县人。”

王钊咂了咂嘴唇：

“啧啧，咱俩是老乡呢。”

李升可能认为自己是个工人，不便和工委书记这样的大干部认老乡，嘴里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但脸上却泛起了兴奋的微笑。

王钊用右手食指在左掌心划拉了几下：

“哪个升？高升的升？”

李升摇摇头：

“俺这辈子命不济，没起个好名字，是一升米两升米的那个‘升’。”

王钊刚想要为他纠正，但看到李升一脸郑重的神情，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李升好像觉察到了什么，又自言自语地说：

“俺这辈子没入过一天学堂门，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升’，多亏手戳上有个记号，要不，我连倒正都分不清呢。”

老工人的这几句表白，说得王钊的心直往下坠。他一时默然了。

这当儿，厨房的大师傅把饭菜端了进来。本来，进入冬季后，工人在食堂里吃饭很冷，没等吃完饭菜就凉了，于是便改在工舍里吃饭。今天厨师端进来两个大木槽子，一个槽子盛的是玉米面饼子，另一个槽子里盛着稀溜溜的黄豆芽汤。两个木槽子并排放置在屋地的长条木案子上。

如果是往常，在山场劳动了一天而中午只啃了几口冻干粮的工人们，晚上回来吃饭，早饿得会忽拉一下子围过来，你拥

我挤地抢着盛汤拿饼子，但今天却例外，你瞅瞅我，我看看你，没有人上前。

王钊招呼着：

“来，都快吃饭吧！”

工人们有的坐在木杆铺上，有的就站在地上，可还是没有人动弹。

王钊的目光逐一在每个人的脸上掠过：

“大家早该饿了，为啥不吃呀？”

不少工人都本能地望着自己的那双手——尽管在收工时已经用雪把手心手背都搓过了，但还觉着不干净。所以，在工委书记没拿玉米饼子之前，他们是不好意思先拿的。心思着，人家是比森工局长还大得多的官儿，一旦嫌乎怎么办？

王钊好像猜透了工人的心思，他走过去，扯着李升往木案子近前拉：

“老乡，你先带个头吧！”

李升挣了一下胳膊，后退了一步：

“俺们心思让你先吃。”

王钊有些着急了，又用力拽了李升一下：

“大家伙干一天活了，我怎么能先吃呢？！”

李升不好再拗劲儿，一边笑着，一边把那双粗糙的大手在棉裤上又狠劲儿蹭了蹭：

“王书记不嫌乎，那我们工人就先吃了！”

他把手伸进大木槽里，一把抓了两个饼子，接着又在另一只木槽里盛了一碗黄豆芽汤，接着便大吃大嚼起来。

在李升的带动下，其他工人都忽拉一下围上来，一个个拿完饼子又盛黄豆芽汤，随后便站在长条木案旁，或坐在木杆铺上，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

最后，王钊拿起个玉米饼子，也盛了碗黄豆芽汤，站在了

李升身旁。

李升握惯了锯把和杠棒的手很粗糙，很有力气，据说那四斗重的米袋子，他伸手就能抓起来。可眼前的这只手，却显得很无力，很笨拙，三个手指紧紧地攥着那双筷子，几次想从碗里把黄豆芽夹起来都没成功，有一次总算夹住了一粒黄豆芽儿，可没等送到嘴边又掉了。

王钊在一旁看得真切，侧过头问：

“老乡，你怎么了？”

李升伸开那只手，苦笑着说：

“茧长得太厚，手笨了。”

李升的手，骨节粗大，手茧厚厚一层，又板又硬连拳头都握不紧成。王钊用手一摸，紧接着深情地用力一握，握得很紧很紧，长时间没有撒开，可也没说一句话。看得出来，他有些激动……

林业工人干的是重体力活儿，放大树，抬大木头，整天裤裆里“抓蛤蟆”，都是乏身板儿，干了一天的活儿，撂下饭碗便纷纷爬到自己的铺上想要睡觉了。

饭后，刘文秀忙着回办公室开会去了。为了保证王钊能休息好，他走前让工人们在木棚中间的铺位上腾出个空儿来，可王钊想和李升继续唠扯，便自己改在了李升的临铺。

这时，李升已经脱下一双棉胶皮靴，正从脚上解裹脚布，一见王钊走过来，急急忙忙把解下的裹脚布缠巴缠巴塞进了鞋窠里，放在了木杆铺下，还特意往里推了推。

没想到，王钊紧接着一弯腰又从木杆铺下将那双棉胶皮靴拽了出来，想替他搭在铁丝上烤烤。

登时，李升可慌了神儿了，猛地蹦下地，一把从王钊手里把那两只胶皮靴夺了下来，红着脸儿说：

“嗨！这东西挺熏人的，你别拿。”

王钊望着那双被抢走的湿漉漉的棉胶鞋，争辩地说：

“不就是有点味儿、熏点人吗！可总得要烤干它呀，明天穿着干活好施展哪。”

李升激动地哆嗦着嘴唇：

“这东西……干净人闻不得！你不怕熏得睡不着觉？”

王钊笑了，说：

“放心。当年在山东打日本鬼子那阵儿，我什么苦都受过，什么罪都遭过，裹脚布子有点味儿算什么！”

王钊出生在山东省长山县（现邹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很快侵占了山东各地。王钊当时只有十四岁，可他和广大的爱国青少年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侵略的战争，开始在儿童团站岗放哨，为游击队传送情报。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先后任长山县六区、一区、七区的青年救国会会长，积极组织青年抗日活动，后又到根据地做民主政权建设工作。当时条件极其艰苦，既要和日本鬼子进行殊死的战斗，又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那八年的时间里，王钊经受了痛苦的煎熬，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每每想到这些，他总觉得眼前的一切艰难困苦，都是那么微不足道。

李升终于把那双棉胶皮靽鞢和裹脚布搭在了火炉旁的铁丝上烤着，然后脱去秋衣，露出了他健壮的躯体，也露出了后背上那个高高隆起的形似蘑菇又紫得发黑的肉瘤子。

王钊以前曾任松江省委林业部代部长、部长，对林业工人的情况还是熟悉的，此时，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上楞工人被杠棒长年压出的“血蘑菇”。他的心再次被深深刺痛了——一个血肉



之躯，天复一天，年复一年，肩上总是压着坚硬的杠棒，抬着几百斤甚至几千斤重的原木归楞上垛，即使是铁的肩膀，也会被那杠棒压得变形，磨掉几层的?! 就在这一刹那，王钊明白了这么健壮的老工人为什么会驼背。

李升本能地用手摸了摸背上的“血蘑菇”，嘘口气，自我嘲弄地说：

“要比这家伙，全伐木场就数我了——一个儿大，色儿重，禁磨，棒硬!”

一阵笑声过后，王钊问：“来林区多少年了?”

李升伸出三个手指头：

“我十八岁来林区，一色是做木头，这不眼瞅着就够三十年了。”

王钊提高了声音：

“是个老木把啦!”

李升挑了挑眉梢，似有几分骄傲：

“这些年，我这两只手少说也放倒了几万米木头，这肩膀头也抬了几万棵原木片子。要是一棵棵接起来，也许能到北京城了!”

大家又是一阵笑声。

这话一点都不错。他们靠着一副肩膀两只手，长年干着笨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解放后这几年，正是这些粗犷、憨实的老林业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完成了党和国家交付的木材生产任务，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那些运往祖国各地的木材，哪一棵上不沾洒着他们的血汗呢？想到此，一缕对老工人的崇敬之情在王钊的心底油然而升起。

好一会儿，王钊又问李升：

“你也是逃荒出来的?”